

東西之間找尋「革命者」的 內在邏輯

——評張歷君《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

● 殷鵬飛



張歷君的新著《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不僅在論域的選擇上與中國大陸當下研究異趣，而且擺脫了慣有的「衝擊—回應」或「影響—接受」思維模式，將理論問題置於1920至30年代中國革命的複雜語境之中進行具體分析。

張歷君：《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一 前言

近年，隨着西方「新文化史」、「社會史」等新方法、新視角的引入，中國大陸學界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漸漸將

焦點置於日常生活、情感、媒介等文化政治議題，對中共黨史中經典人物的研究反而漸趨冷淡。與這一冷淡反應相對應的是，1980年代至世紀之交的這段時間內，研究界形成的對黨史人物、左翼文學的研究熱潮。在「思想解放」和不斷「去政治化」的進程中，黨史人物逐漸「脫敏」，相關論著也往往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形成了對1949年後不斷激進化的革命史敘述的「祛魅」。

瞿秋白（1899-1935）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曾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被認為是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隨着瞿秋白就義前所寫的〈多餘的話〉浮出水面，以及中國不斷走向激進的革命進程，瞿秋白在文化大革命的「揪叛徒運動」中被冠以「叛徒」的罪名。文革結束後，隨着1980年〈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複查報告〉的發布，瞿秋白的「忠/奸」問題在官方層面有了論定。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瞿秋白研究在1980至90年代一度形成熱潮。這一時期出版的專著如王鐵仙《瞿秋白論稿》、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在

當時看來無疑具有開拓之功^①。但在今天看來，由於史料文獻、宏觀視野、問題意識的缺乏，研究者的行文論述更多是對人物生平的羅列和歷史資料的排布，而未能從思想史、社會史等角度對瞿秋白進行更深層次的把握。值得一提的是，在1981年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所著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在中國：瞿秋白的影響》(*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一書中，研究者較早地意識到瞿秋白1930年代的思考與1949年後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文學之間的關聯性，但受限於材料，不少值得探討的話題亦未能展開^②。

時過境遷，研究熱潮所帶動的有關史料和軼文的發現、年譜的編纂，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瞿秋白文集》「文學編」和「政治理論編」的陸續出版，無疑為研究的再度推進提供了契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張歷君的新著《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引用只註頁碼)，不僅在論域的選擇上與中國大陸當下研究異趣，而且擺脫了慣有的「衝擊—回應」或「影響—接受」思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本書將理論問題置於1920至30年代中國革命的複雜語境之中進行具體分析。在此意義上，本書無疑為相關研究的開拓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啟發。

在1990年代以來「歷史終結」的氛圍下，不少對於中國革命史的研究更像是對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缺席審判。居於審判者視角的研究者，勢必難以細緻地分析中國革命所具備的內在動能和邏輯以及

與當下中國之間的關聯和張力。本書不僅擺脫了既往研究中存在的「審判者」思維，更重要的是以一種思想史的寫法進入瞿秋白思想的內在邏輯當中，追問「革命者」何以生成的根源所在。張歷君自陳受業師李歐梵多次談及的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雙方面』的辯證法』影響(頁6)，因而在總體思路上，本書抓住瞿秋白「思想雜交」(intellectual hybridity)這一特點，具體分析了「領袖權」(“hegemony”，瞿秋白的譯法，頁48)、佛教唯識宗、柏格森主義(Bergsonism)和歷史唯物主義在瞿秋白思想中的多重交錯和形變。作者覺察到瞿秋白與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佛教唯識宗、無政府主義等諸種不同的思想資源之間的「同時代性」，在紛繁錯雜的歷史進程中展開對於瞿秋白思想複雜性的探尋。書中瞿秋白不是被動吸收各種思想資源的「海綿」，而更像是一面歷史的多稜鏡，折射出不同思想資源在1920至30年代中國革命進程中所透出的光暈，不僅照亮了革命史敘述陰面的那個瞿秋白，同時還顯影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和文學所內蘊的強大思想勢能，在不同思想路向的交錯中重新打開了對瞿秋白——這位曾經飽受批判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理解。

本書以「跨文化現代性」為經，將「文化互化」的問題意識貫穿始終，力求把瞿秋白「將來自各種不同文化脈絡的思想資源，創造性地轉化成嶄新的思想和思想軌迹」的過程揭示出來(頁32)；同時，作者沒有拘泥於對抽象的思想衍變的呈現，而是以三個具體問題為緯，在具象的歷史中展開對思想變奏所產

本書將「文化互化」的問題意識貫穿始終，從「領袖權與有機知識份子的形成」、「生命衝動、革命政治與菩薩行」、「自殺之道」三個部分探討各種思想資源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背景下如何融會貫通，並最終形成瞿秋白「革命者」的品格。